

元新闻话语、新闻认识论 与中国新闻业转型^{*}

周睿鸣

摘要 转型是谈论中国新闻变迁的关键词,是新闻从业者论述新闻组织创新实践的话语。运用元新闻话语和新闻认识论这两个核心概念,旨在指出数字媒体兴盛时期理解新闻、新闻实践如何正当化,新闻如何作为公共知识的规范信条和经验探寻之道。结合澎湃新闻这一案例,不难发现:转型中的核心张力潜藏在新闻组织承袭自大众媒体时期的专业导向逻辑和数字媒体时期的网络化逻辑之间;在后一种逻辑下,作为文本的新闻与作为特定职业门类的新闻业相剥离;新闻实践的行动者泛化至所有作为节点的网络主体,这些实践主体围绕何为新闻、新闻为何进入了持久的正当性话语争夺、边界争锋和社群化的知识生产。在新闻业转型当中,液态的元新闻话语和新闻认识论有助提升新闻实践的开放参与,但亦要防止实践活动消解社会基本共识、陷入相对主义。

关键词 转型;元新闻话语;新闻认识论;网络社会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21)02-0108-10

DOI: 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1.02.013

作者简介 周睿鸣,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导 浙江 310058

一、引言

转型是贯穿近年来中国新闻变迁的关键词。它指向如下线性的规范理念:随着数字媒体日益受到公众的青睐,传统的大众媒体应当加紧数字化自我改造,成为数字媒体队列中的一员,挽救流失的社会影响,重新激活自身的商业潜能。对新闻从业者和媒体评论家而言,转型是新闻组织乃至整个行业走出困顿的不二法门,是新闻从业者行至职业生涯十字路口的理性选择。^{①②③}技术进步似乎赋予转型天然的正当性,它不可逆转,须顺势而为。对新闻研究者而言,转型似乎也是新闻业陷入全球性的技术和商业危机后不言自明的叙

述前提。^{④⑤⑥}

学理地看,转型作为论述新闻数字化变迁和创新活动的话语出现。支配和运用这套话语,在新闻实践中贯彻这套话语,从业者开发、借鉴了一系列诸如即时、互动等创新理念,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具体地部署这些理念,策略不一而足,成为转型这一语汇统摄下大众媒体数字化的改造良方。然而,在对转型过程加以描述,并对其发生机制和后果加以解释的同时,作为文本和社会实践的新闻发生的变化却缺乏经验支撑的实证理解。本文旨在回应这一关切。

运用元新闻话语和新闻认识论这两个概念,本文拟探讨新闻数字化变迁当中的基本问题:如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中的新闻业创新:理念、过程和社会影响——一项新闻民族志研究”(18YJC86005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本刊评审人就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何定义新闻、如何理解新闻实践。在专业化新闻实践遭遇历史诘问,甚至被判定为行将就木的历史遗存之时,释清何为新闻、新闻何为不仅是在数字媒体日益兴盛的当下继续新闻研究的理论前提,而且是开启数字化新闻实践这一社会行动的基本规范指南。

二、透视新闻变迁:元新闻话语与新闻认识论

新闻从业者有其特定的开展新闻工作的实践理路。将生产常规、组织配置等社会实践过程提炼出来,形成与实践理路相配伍的谈论方式,反映具象的日常新闻实践及新闻从业者所处的权力关系,这便是新闻话语。拆解抽象的新闻话语,对新闻话语的历史形成及变迁动态加以追问,就构成了所谓元新闻话语——有关新闻话语的谈论方式,即是关于话语的话语。卡尔森(Matt Carlson)认为,若将新闻工作理解为矗立在特定语境、时空条件和内外部行动者之中的文化实践,那么,元新闻话语就处在这样的位置(site)上:行动者公开地投身到寻找定义、设定边界、为新闻工作的正当化组织理据的过程中。也就是说,通过元新闻话语,新闻业内外的各路行动者竞相建构、重申甚至挑战可接受的新闻实践边界,以及可做或不可做的事情的界限。作为理论模型,卡尔森意义上的元新闻话语从行动者、位置/对象(audience)和主题三个组成部分出发,与定义新闻工作、边界厘定和新闻工作的正当化相联系。^⑦

新闻业有着丰富而相对稳定的专业化历史;新闻学的核心和新闻组织内部运作的预设一致是新闻研究问题生发的起点。在近年来的新闻变迁中,上述稳定的专业化趋势和新闻组织运作的预设一致面临挑战。就其职业意识形态、职业文化以及这两者在生产常规和组织结构中的沉淀而言,新闻工作被重新配置为后工业化、企业化和非典型的方式和状态。复杂的职业转型汇成了新闻变迁的过程;众多新闻实践激发了对新闻的更广泛定义和理解。^⑧这就是说,新闻变迁的核心是元新闻话语的持续重塑。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是这样的一场剧目:它既是数字传播技术的行业适配,又是有别于新闻从业者的新兴社会行动者日益渗

入新闻实践,并在实践中与新闻从业者分庭抗礼,推拉、争夺新闻边界,为各自的实践活动书写正当化台本。每种新媒介形态、新数字传播技术、设备及其应用往往都被预示为与现有媒介形态、技术、设备及其应用根本不同。它们的出现和普及促使人们猜测它们对现行新闻规范和做法构成的潜在挑战。^⑨例如伯纳德(Stephen Barnard)对社会化媒体推特的分析:随着新闻领域对网络时代的适应,新闻业的实践、资本、惯习和信念(doxa)等要素都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展示了推特在新闻规范和价值观转型中的角色。作者认为上述变化促成了混合型、网络化的惯习的出现,这种惯习将传统新闻领域的价值观、实践与数字和非专业源流(origin)整合在一起。^⑩克里奇(Brian Creech)以35毫米相机为例:作为早期大画幅相机与当代数码摄影之间的技术途经点,35毫米相机为审视看似惰性的技术操作与新闻意义生产模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用的历史范例。他指出,随着设备成为媒体实践中更加明显和不可或缺的部分,研究者必须关注哲学、专业话语和技术限制如何构建了这些技术的部署方式。^⑪卡尔森则分析了数字新闻时代的算法和新闻判断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指出,新闻辨识(journalistic judgment)既是新闻业的核心功能,也是充满争议的功能。在传统新闻话语中,客观性原则的高优先级和新闻价值的外在化几乎没有为新闻从业者主观辨识的正当性留下空间,构筑了内在的紧张关系。随着算法在自动化新闻传播和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多,上述紧张关系变得更加明显。算法辨识(algorithmic judgment)对传统的新闻辨识提出了根本挑战:人的主观性本质上是可疑的,需要被替代,而算法本质上是客观的,需要被实施。以算法辨识取代人的辨识,对新闻的形态及其正当性话语都会产生重大影响。^⑫新旧行动者的历史性相遇和碰撞时刻激发着对新闻工作的重新定义,促使行动者在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完善自身对实践活动的正当化,划定话语边界。

简言之,元新闻话语重塑的关键议题是调适作为职业力量的新闻从业者与非职业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在近数十年的新闻数字化变迁史

上,尤其在新闻业内部充满不确定的当下,公众怎样借助各种技术赋权形式和新闻叙事模式参与新闻生产,这样的开放参与活动如何确保其公共底色,一直为研究者关注。费鲁奇(Patrick Ferrucci)等人对新闻行业杂志中元新闻话语的文本分析显示,虽然围绕参与式新闻的具体语言是新的,但这种元新闻话语对新闻从业者和受众关系的重新概念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公共新闻运动。费鲁奇等人的研究表明,无论过去还是当下,上述试图倡导公众参与的行业运动在动机、目标以及对新闻受众的想象方式上非常相似。^⑬ 研究者认为,民主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公民新闻网络的横向或点对点的公共领域,而且还体现在通过公民参与形成更具反思性的新闻消费文化的可能性。^⑭ 通过分析创业新闻^⑮、事实查验^⑯,作为大众文化组成部分的电视剧^⑰,以及媒体元评论对媒体实践和表演的批判性反思^⑱,研究者们归纳了新闻业在经济、技术、文化、政治诸多方面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如何通过重塑元新闻话语想象未来新闻业图景的共识基础和进一步研究的可能。^⑲

在新闻研究的谱系中,新闻认识论是比元新闻话语地位更超然的上位概念。新闻认识论是研究新闻从业者和新闻机构如何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东西,以及如何阐述和证明知识主张。与论证有关的实践已在以下方面得到研究:(1)文本和话语;(2)新闻从业者在编辑室内外的实践、规范和常规;(3)受众对每则新闻的评估以及对新闻知识主张的接受或拒绝。新闻认识论还包括将新闻和新闻业作为知识的特殊形式进行研究。在新闻研究中,新闻认识论的社会学取向已经发展起来,以了解新闻加工中的制度化规范和实践,了解社会共享的、可变的理由标准,以及新闻业在社会中提供专属知识形式的权威性。^⑳

近年来,数字化、新兴的数据新闻样式兴起、新闻生产周期加速,人力资源、财政压力以及受众参与渠道的变化,使得新闻认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新闻编辑室对算法、自然语言生成(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 NLG)等技术的吸纳^㉑、数据科学与数据分析的部署、数据与计

算驱动新闻等新闻风格的出现^㉒、诸如业余摄影师等非职业力量在新闻实践中的日益显现^㉓,这些变化无时不在提醒新闻研究者和实践者。随着新闻实践的数字化,新闻从业者通过新闻工作提供公共知识、维系公共生活这一垄断型权力已被打破。有研究者考察了新闻媒体与社会化媒体平台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指出系统地分析新闻认识论与新闻变迁和社会化媒体变革的相互关联可从三个方面着手:(1)知识勾连(articulated knowledge)和真相声言(truth claims);(2)新闻实践活动的正当性;(3)受众活动中对知识声言的接受/拒绝。^㉔ 非职业力量在建构公共知识、缔造真相声言的可信度、可验证性和正当性上对作为职业力量的新闻从业者构成挑战,推动研究者思考如何在数字媒体兴盛时期的新闻认识论,以“社会认识论”“参与性认识论”的名义重思、调适搭建传统新闻样式的实践伦理和技艺准则^㉕、吸纳非职业力量中不同社群的多重知识主张。^㉖ 数字媒体兴盛的历史变化同时激发了研究者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新闻认识论乃至新闻文化变迁的探查。^㉗

新闻变迁往往被刻画为数字传播技术引发的、迁延至营利模式层面的行业危机。二十多年来,围绕公众对博客、微博等数字媒体的使用,研究者结合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新闻权威(journalistic authority)、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等概念为中心展开探讨,关注新闻从业者与外部力量之间的话语争夺。这些研究存在共享的规范预设,即无论新闻场域中的技术引入、商业运作和权力关系如何变动,新闻实践都应当服务民主的公共生活这一目标。^㉘ 然而这一主张的悖论和内在矛盾是它恰恰依存于稳定的社会共识,即新闻业(至少是多重社会力量参与的新闻实践)是被公众广泛认可的行当;只要不无反思地践行这一行当的专门手艺,这套话语就能够在不同社会力量的碰撞与竞合中反复实践,拱卫上述目标。这种假定不仅简化了公众对专业导向的新闻话语、观念及其实践的复杂认识,而且预置了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这些具有宰制力的社会行动者在制度上对新闻业的坚定背书。现实情况是无论哪种媒

介体制、政治权力、商业资本乃至社群至上的民粹力量对以公共利益为规范目标的新闻实践实施了从符号到物质上的压制,包括以新闻之名对新闻场域开展的侵蚀。在此前提下,从规范地倡导以新闻实践观照公共生活转移至结合特定语境考察新闻认识论的经验变化,是透视新闻变迁复杂性的上乘之选。为把握中国新闻变迁,本文以中国新闻组织的转型为例,据此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如何描述中国新闻组织转型中的元新闻话语?在此语境下,如何解释新闻认识论的变化?以下,本文将结合澎湃新闻(以下称“澎湃”)这一案例回答上述问题。

三、新闻业转型中两种逻辑的碰撞:基于澎湃的个案分析

澎湃上线运作已六年有余。它的成立要追溯至2014年夏天。彼时,国有的上海报业集团(以下称“上报集团”)已完成整合重组。旗下的市场导向“都市报”《东方早报》(以下称“东早”)孵化的移动新闻客户端澎湃已经酝酿了一年左右。在上报集团的指导下,澎湃以集团三大“新媒体项目”的名义正式与公众见面,与东早这张“都市报”并行运作了三年多。2017年1月1日,东早休刊,其工作人员、定位与职能完全转移至澎湃,近十四年的办报史画下句点。

澎湃这一案例具有质性研究意义上的典型性,表现在其作为职业力量面对的权力关系上。对经历转型的新闻组织来说,描述其元新闻话语的变动、解释它新闻认识论的变化,就要观察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这就是要求研究者关注:在数字传播技术变革的历史语境下,政治权力、商业资本乃至公众如何共同推拉、形塑了新闻组织面临的结构势能与约束。澎湃是国有上报集团的产品,具有党管宣传机关的色彩,与体制紧密依附;东早十余年来的市场导向运作为澎湃蓄积了持续市场化经营的惯性;得到数字技术赋权的公众在互联网上延伸日常生活,开展广泛的政治参与。一句话,以澎湃为例探究转型可窥见权力、资本、公众对职业力量的牵动和制约。

从蓝图到实施,澎湃的转型划出了与早前同

行不同的轨迹。这被部分受访者概括为“激进转型”。它是细碎的,包含一系列思考及操作,例如:数字终端不是陪衬报纸的副产品,而是新闻首发登载的主要出口,这意味着从定时做版到数字化实时更新新闻的生产重心转移。这一思路的变化附带了组织架构上的革新:尽管澎湃自东早孵化而来,但前者不隶属于后者;除了采访资源,自编辑到发布的关键权限皆相互独立。此外,不同于东早对报道议题类别的部门拆分,初创期的澎湃将议题类别进一步细化,把编辑权限下放到体量更小的报道组,拟通过竞争优胜劣汰报道组开设的专门栏目。不止于此,澎湃还有意告别了“东方早报”这一指向报纸的称谓,以及与之相应的品牌及版式设计。这些细碎的策略打包在一起便成为部分受访者口中的“激进转型”套件。实际上,这一套件充满了路径依赖的色彩以及驱动路径依赖的价值观:转型沿袭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市场导向改革的思路,是报界人士在党管新闻工作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持续的市场化配置推动专业化,以专业的新闻作品满足公众知情权、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延伸。在此思路中,技术既不是具备自主性的社会力量,也不是令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因素,而只是一种既需要顺应又可为我所用的工具。这种工具式的体认被认为能够持续释出新闻业专业化发展的动能。也就是说,转型是在媒体市场导向改革中以技术手段发现“蓝海”,寻求继续“解放生产力”的增量,以利实践活动朝着新闻本位这个理想标准继续进发。

转型的核心是调适。所谓调适指的是:新闻从业者创新活动中面临数字传播技术营造的实践场景,以及由此引发的体制、资本、公众与职业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的不稳定与震荡,为平衡这样的权力关系紧张、趋向稳定的制度环境而通过新闻组织采取的行动。平移专业导向的新闻话语反映了新闻从业者维持定义新闻工作、厘定新闻边界的自然垄断,在新闻组织内主导创新实践,试图继续以“上一下合作”重申场域自主的愿景。

结合作者的参与观察和访谈,本文认为澎湃至少从三个方面展开调适。一是新闻生产的即时性。大众媒体当道时,新闻组织开展生产活动须

遵循周期节律。新闻处处有,而新闻组织要按日、按周、按月出版,就不得不在组织层面消除不确定,为此作出架构安排。数字媒体兴盛后,新闻线索多如牛毛,截稿时间亦在信息实时更新的互联网前被抽去了组织运作层面的意义和作用。中国互联网行业二十余年的发展激活了信息传递的效率,满足了受众的信息需求,但也日益形塑并固化了新闻低成本甚至零成本产制的现状。澎湃的做法是:细分报道组的报道议题类别,综合运用线上线下资源挖掘、定制新闻线索;设定诸如八小时一班、一日三班倒的截稿时间及工作机制;既生产原创新闻,同时又抓取、编辑、推出业已制成的新闻,形成实时更新的新闻“瀑布流”;善用推送通知,等等。澎湃这么做,是要在这样充满不确定的变迁中寻找时间上的确定性。

二是反映于社区再造的互动性。单单通过追赶秒的时间策略来刷新自身的新闻生产节律是不够的:澎湃不再享有东早依靠稀缺的大众媒体资源聚集的公众注意力。数字媒体当道,大众媒体依靠注意力享有的社会影响和市场化生存策略受到连锁冲击。因此,将互动模块嵌入新闻应用程序,在产品迭代中坚持开放参与的创新试错,成为澎湃重造新闻社区的创新实验。从早期版本的“热问答”“问吧”到日臻稳定的“湃客”专区和基于此的“澎湃号”,通过建立“湃客”读者群、举办“数据创作者大会”“澎湃·镜相”写作大赛等活动,结合在微博、微信等国内主流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持续运营和引流,以及线上线下与不同社会力量围绕新闻进行的协作和反思性对话,澎湃将协作式新闻策展的理念逐渐融入专业导向的新闻话语。

三是反映于叙事模式的创新之中。上线一周年,澎湃推出《三峡》融合报道,探索综合运用多重媒介元素融合叙事。此一尝试过后,各报道组以短视频试验新闻采制;澎湃亦悄然开启“内部创业”,抽调若干报道组部分乃至全部成员投入视频项目测试。这一测试既应和了用户对包括短视频在内的视觉导向型叙事模式日益凸显的审美偏好,又反映了澎湃对资本追逐短视频这一新兴叙事模式的及时嗅探,以及由此实现自身市场运

作潜能评估的增值。值得注意的是,视频项目测试过程中出现了内部微妙的分途:一部分参与澎湃初创的新闻从业者离职,以内容创业之名走出新闻组织,加盟由华人文化领投的互联网企业“梨视频”,试图继续运用短视频向公众提供严肃的内容服务。梨视频上线月余之后,澎湃迎来六家国有独资或全资企业对澎湃新闻运营主体——上海东方报业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入股。至此,短视频成为澎湃和梨视频日常新闻/内容生产的主导叙事模式之一。

如果从制度层面理解中国新闻组织的转型,把新闻业视为社会运转当中不可或缺的制度部件,那么可以说,新闻从业者的转型理念折射出他们平移专业导向新闻话语的期望。尽管以上三个方面并非澎湃调适的全部图景,但它们揭示了中国新闻业转型中的核心矛盾,即两种逻辑的碰撞:一面是承袭自大众媒体话语垄断时期新闻组织的专业导向逻辑,另一面则是随着数字技术日益赋权传播主体时显现的去中心式的网络化逻辑。以上展示的三方面调适袒露了专业导向逻辑在网络化逻辑面前的话语乏力。当专业导向逻辑遭遇网络化逻辑,调适捉襟见肘甚至难以为继,新闻话语便不得不在元话语层面重构。由此,新的新闻实践主体和场所出现,新闻和新闻工作的定义被改写,新闻常规和规范的液态特征日趋明朗,围绕新闻边界的话语攻防和正当化争锋亦频繁浮上台面。

四、当代中国新闻业转型中的调适与逸出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中指出,所谓网络是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nodes),节点是曲线与己身相交之处。在信息时代文化表现与公共意见根源的新媒体全球网络中,节点是电视系统、娱乐工作室、电脑绘图环境、新工作团队以及产生、传送与接收信号的移动式设备。网络是具有高度活力的开放结构,能够不断创新;只要能够在网络中沟通,分享相同的沟通符码,新的节点就能被整合其中。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是权力关系剧烈重组的来源。^④由此理解新闻组织转型过程

中新闻从业者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网络社会中,能够传送信息、表达意见的数字互联终端都可以成为节点。换句话说,无论个人、社群还是机构,无论职业背景如何,只要能充当节点,传播主体间的信息交换和意见融通就可以完成。理论上,这颠覆了大众传播时期新闻从业者宰制信息流动的局面,改善了新闻从业者同受众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普惠的网络化逻辑亦冲击着新闻职业文化——在缺乏制度支持和社会共识的时空条件下尤为如此。具体到中国语境,中国新闻业无法也不可能像过去百多年来的欧美那样,在历史形成的社会制度逻辑中缓慢抵御网络化逻辑的冲击和改造。结果就是,新闻机构及其从业者难以向过往如日中天的大众媒体那样,在网络社会中成为支配性的(至少是富有权重的)节点。新闻从业者逸出行业边界开展的创新实践,以及新闻从业者身份转换过程中的理念重组,就可以理解为网络化逻辑之下各节点协作开展公共生活的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中的节点可由多重主体来扮演,但他的论述显示,卡斯特并非将网络社会视为技术支持下线性可得的乌托邦。他认为网络是多重的,网络之间的操作符码和开关机制是塑造、指引与误导社会的基本来源;连接网络的开关机制是权力的特权工具,掌握开关机制者将成为权力掌握者。他强调了信息时代国家主义再结构的过程,认为国家能够是也曾是技术创新的指导力量。如果国家反转其技术发展的兴趣,或者无法在新条件下完成技术发展时,国家主义的创新模型就会导致停滞,因为社会创造与应用技术的自主创新能量会被扼杀。^⑫据此,卡斯特的主张至少有这样的启示:信息技术加持下,社会的网络化绝非是技术决定论的进步过程,而是社会各行动者运用技术加以互动,或改造技术为拟仿人类的有限社会行动者,迭代地投入社会互动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以网络社会分析社会变迁时,研究者应当考量的是信息技术参与之下国家—社会关系的复杂变动。

据此,本文以元新闻话语及新闻认识论这两个概念透视中国新闻业转型,回答本文提出的两

个研究问题。基本的预设或者说区分是以下两者的相互剥离:作为文本的新闻(news)和具有现代工业社会特征、以组织为单元并被制度化、可被视为专业加以考量的新闻业(journalism)。也就是说,新闻文本不再由新闻从业者垄断产制,网络社会中的任何节点都有可能成为文本生成的主体。相应地,新闻工作亦不再受制度化的新闻组织束缚。网络节点的相互连接既可以创造性地遵从富有现代色彩、工业式流程作业的组织化实践原则及生产过程,又可以超越现当代新闻业的藩篱,突破组织这一生产单元,不以恒常的新闻常规为节奏,亦不以建构可持续的新闻权威为正当化实践行为的符号资源。如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及其共同体那样,这使得元新闻话语进入了长时的液态状态:当网络社会中的任何节点声称其生产/生成的文本是新闻时,当这些节点表明其所在的社群、阶层、职业是其产制新闻代表的身份时,当上述节点通过新闻讨论了观照目标群体的特定议题时,他们就在元话语层面上成为新闻实践的行动者。他们生产/生成了新闻文本,同时亦参与定义何为新闻,或隐或显地正当化了自身的新闻活动,厘定或推开了新闻实践的边界。相应地,网络社会中关于新闻的认识论也进入了难以停歇的历史性争锋:当任何网络节点均可能生成产制了新闻文本,并附带了元话语层面的实践定义、边界厘定和正当化之时,新闻生产/生成的实践原则和常规节律亦将随之震荡。受众将按照自身所处网络空间的连接状况做出判断,决定接受哪些节点、通过什么样的文本和话语、围绕什么议题制成的新闻。这个判断和决定的过程就是受众对文本展开评估,对新闻作为网络化社会知识的接纳或拒绝的过程。

结合元新闻话语看转型:新闻工作仍由新闻从业者这个职业群体主导;创新活动发生的场所仍是制度化的新闻组织,公众仍是被说服的创新实践服务对象。转型中,组织内外的话语协商并不在新闻人和公众相互平等、公开、充分的说理中展开。可以说,转型理念及其包裹的专业导向新闻话语反映了新闻从业者对定义新闻工作的垄断。新闻从业者将重申新闻实践边界视为理所当

然之事,围绕这一边界构想的厘定实践仍主要发生在体制和新闻机构之间——如何“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和“天花板”,以“上一下合作”的形式充实新闻场域的自主性,拓展专业导向新闻话语的实践空间。由此理解元新闻话语背后的新闻认识论:新闻话语连同其实践创造的新闻文本,反映的是新闻从业者在维系组织制度化、行当专业化的基础上,继续告别宣传范式、向专业新闻范式进发的观念,以及依此观念、比照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新闻机构制订的周期性新闻生产流程、节奏和规约。新闻从业者的受众评估及其接受态度仍停留在迂回的猜测当中:受众调查和研究的匮乏使得新闻从业者无法实证地把握读者的审美、品味和阅读偏好;在此基础上,包括新闻从业者在内的各社会群体普遍匮乏对何为公共、何以公共的理解,进一步限制了新闻从业者想象、让渡和激发公众参与新闻实践的可能。不过,随着转型的推进和深入,专业导向的元新闻话语和新闻认识论的调适之艰,日益在网络化的传播逻辑中显现出来。重新打量前文谈及的三方面调适——即时、互动与叙事模式的调适,具体来说:

首先,与其说时间观上的创新是铺开即时新闻的生产,并在生产活动中推行即时性的理念,不如说“互联网时间”——由门户网站、新闻客户端和社会化媒体等互联网信息服务终端及平台共同造就的信息传播速度及其文化,正在成为新闻组织转型中对表的标的。这种对表简而言之就是锚定常规,即在对表过程中调整并试图固化新的周期节律及组织架构安排的创新行动。它的出现不意味着新闻组织开发出了适用于新型业态或传播方式的新生产常规。相反,它展露的只是寻求新生产常规、达成某种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闻组织的创新行动搭载了明显的期望,即弥合长久以来屡试不爽的、大众媒体时期的传统周期节律与“互联网时间”之间矛盾的期望。

其次,与其说开放参与上的创新是为传统新闻生产注入互动性,以虚怀若谷之姿态主动接纳甚至力邀各社会群体投入参与式生产活动,不如说这是在跟随专门的虚拟社区被动地亦步亦趋:问答互动有知乎这一范例的影子,政务号、澎湃号

的平台化运作折射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的轮廓,产品迭代离不开某一社会化媒体实例作为典范和参照;坚持运作澎湃官方微博、微信等主流社会化媒体账户曝光的不仅是澎湃难以拒绝的流量诱惑及潜在社会影响,而且有澎湃作为关键新闻机构对社会化媒体作为主导信息终端的注意力资源依附。即使历经时间的初步打磨,如今的澎湃以澎湃号的平台化运作达至了暂时稳定的内外协作,但它依然无法将澎湃推回到东早时期大众媒体对公众互动议题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得不接受自身作为中心式组织结构在去中心程度较高的社会化媒体面前难以引领公众讨论的现实。

叙事模式的创新更加直接地展现了调适的内在紧张。以短视频这一新兴叙事模式为例,数字传播技术恰好被嵌入与大众媒体时期全然不同的媒介制度环境。调适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再由“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背后简单的国家—市场关系所支撑;数字传播技术嵌入的是国家总控、资本主导的,具有重商和消费导向的文化环境,服膺自上而下开展的社会治理逻辑。全新叙事模式的部署意味着从业者直面量化的用户访问数目字,精确的受众消费偏好和审美取向,创新活动的潜在商业价值和营利前景,以及体制对新兴叙事模式的监管。这个制度环境里,新闻业因其衰减的社会影响和市场运作能力而被挤压了本就零碎的、具有某种自主趋势的话语空间。这样,新闻从业者模糊职业身份、跨越行业边界、逸出新闻场域开展互联网内容创业便成为延续转型话语的理性选择。

回应本文的研究问题:转型过程中,中国新闻组织以专业导向的新闻话语入场,以专业导向的实践理念与技艺主导新闻这一公共知识建构的优化。网络化传播逻辑之下,这样的元新闻话语和新闻认识论缺乏制度环境的背书,实践空间明显压缩。新闻组织并未倒向某种网络导向的元新闻话语,亦未皈依将新闻视作彻底的网络化的社会知识,但可以观察到,尚未固化的新闻实践理念和技艺流动了起来,表明网络化传播逻辑之下,专业导向的新闻话语和新闻认识论步入液态,被新闻实践主体不断打磨和重塑。

五、结论与讨论：谨防相对主义陷阱

本文运用元新闻话语和新闻认识论这两个概念透视了新闻的数字化变迁。结合对澎湃新闻这一案例的简要说明，本文指出：在制度环境不稳定、社会共识缺乏的前提下，作为新闻创新话语实践的转型不是新闻组织单调的自我改造和进步叙事。转型的核心张力不在技术适配的成功与否，而在新闻组织承袭自大众媒体时期新闻话语的专业导向逻辑和信息技术支撑的网络化逻辑之间。新闻组织在即时、互动、叙事模式视觉化方面的创新行动均可以解释为新闻专业导向逻辑同网络化逻辑的碰撞，以及对两种逻辑张力的舒缓。借助卡斯特有关网络社会论述的透视可以看到，不稳定制度环境为包括体制、资本、用户在内的社会行动者挤压专业主义话语空间、拓展网络社会制造了可能。在此历史语境下，网络社会视角下日显液态特征的元新闻话语和认识论更适宜描述当下新闻实践的变动：随着作为文本的新闻和作为现代社会公共规范部件的新闻业相互剥离，网络社会中的任何节点均在元话语层面上成为新闻实践的行动者。他们生产/生成新闻文本，参与定义何为新闻，正当化自身的新闻活动，厘定或推拉了新闻实践的边界。相应地，新闻生产/生成的实践原则和常规节律随之震荡；受众通过评估新闻文本接纳或拒绝新闻这一网络化社会知识。

行文至此，一组那又如何（so - what）式的问题浮上台面：一是，以元新闻话语和新闻认识论打量中国新闻业转型带来了什么样的理论增益？二是，以网络社会视角观察新闻变迁，如果元新闻话语和新闻认识论均随着新闻实践主体的泛化而泛化，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一方面标志着新闻业这一行当无可挽回的行将就木，另一方面人类真正进入了人人皆可产制新闻的进步时期？应当说，上述问题反映了相互矛盾的规范预设。在这组预设之下，我们既为新闻实践走向民主和开放感到兴奋和欣喜，同时又伴随着希望和忧虑，打量正在走出职业垄断的新闻实践能否继续为人类带来公共之善（public good）。在新闻组织转型和数字化改造仍在持续、数字传播技术不断形塑我

们日常生活得以依存并发生的社会结构的当下，适当悬置上述规范预设，捕捉新闻实践的动态自然有助从经验上了解新闻变迁。但需要指出，悬置规范不是滑入相对主义。

走向开放的新闻实践应被珍视的是新闻（从文本到实践活动）的公共指向。大众媒体时期，新闻从业者以新闻机构为单元建构了社会共识；在数字媒体勃兴的当下，确保人人皆可参与的新闻实践在开放、理性、自主、协商的反思性公共交往中展开，是维系基本社会共识的前提和要件。所谓相对主义走入的恰是这样的误区，即仅乐见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对新闻机构这一垄断性社会部件、对新闻从业者作为精英群体的话语权威的消解，遮蔽甚至无视了纯粹无中心网络结构对社会共识建构的阻碍。新闻实践中“我有话语权”的公民驱动商议和见证而非专业告知标志了新闻认识论的转变，即从机构专业知识的真相到普通声音的真相的转变。但诚如乔丽娅拉基（Lilie Chouliaraki）所言，应采取更谨慎的、以经验为基础的方式，将普通的声音插入到现代新闻活动面临的再媒介、媒介间和跨媒介的过程当中。新的结构挑战了现有的地方和人类生活的等级制度，从而使“我有声音”的成分超越社区至上主义式的认识，走向承认遥远的他人的声音，方能以数字媒体时期的新闻实践、元新闻话语和认识论回归到以新闻贡献公共善的规范目标上来。^④

注：

- ①刘星《新闻出版行业青年：常加班 挣钱不多 整体“满意”》，《中国青年报》2015年5月7日。
- ②潘春芳《媒体融合时代，行业新闻记者如何转型？》，取自 https://mp.weixin.qq.com/s/IEzCz5VLu2dm_7cKilbR_w，20190917。
- ③张耀升《2017 新闻业大预测：默多克集团转型（时代）停刊？》，<https://mp.weixin.qq.com/s/0DvliP9A3cQmPVO9BWYlAw>，20161026。
- ④丁方舟《“理想”与“新媒体”：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与权力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
- ⑤李艳红、陈鹏《“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
- ⑥张志安、章震《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职业权威的话语建

- 构——基于48家媒体2016年新年献词的话语研究》，《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
- ⑦ Carlson, Matt,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 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 4, No. 1, 2016, pp. 349 – 368.
- ⑧ Deuze, Mark, and Witschge, Tamara, beyond journalism: Theor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Vol. 19, No. 2, 2018, pp. 165 – 181.
- ⑨ Haas, Tanni, From “Public Journalism” to the “Public’s Journalism”? Rhetoric and reality in the discourse on weblogs, *Journalism Studies*, Vol. 6, No. 3, 2005, pp. 387 – 396.
- ⑩ Bernard, Stephen R., “Tweet or be sacked”: Twitter and the new elements of journalistic practice, *Journalism*, Vol. 17, No. 2, pp. 190 – 207.
- ⑪ Creech, Brian, A newsmaker’s tool: The 35mm camera and journalism’s material epistemology, *Journalism*, Vol. 18, No. 9, 2017, pp. 1125 – 1141.
- ⑫ Carlson, Matt, Automating judgment? Algorithmic judgment, news knowledge, and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New Media & Society*, Vol. 20, No. 5, 2018, pp. 1755 – 1772.
- ⑬ Ferrucci, Patrick, Nelson, Jacob L., and Davis, Miles P., From “Public Journalism” to “Engaged Journalism”: Imagined Audiences and Denigrating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4, 2020, pp. 1586 – 1604.
- ⑭ Goode, Lucke. Social news, citizen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New Media & Society*, Vol. 11, No. 8, 2009, pp. 1287 – 1305.
- ⑮ Vos, Tim P., and Singer, Jane B., Media Discourse About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Implications for journalistic capital, *Journalism Practice*, Vol. 10, No. 2, 2016, pp. 143 – 159.
- ⑯ Cheruiyot, David, and Ferrer – Conill, Rall, “Fact – Checking Africa”: Epistemologies, data and the expansion of journalistic discourse, *Digital Journalism*, Vol. 6, No. 8, 2018, pp. 964 – 975.
- ⑰ Ferrucci, Patrick, Mo “Meta” Blues: How Popular Culture Can Act as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2018, pp. 4821 – 4838.
- ⑱ Jacobs, Ronald N., and Townley, Eleanor, Media meta – commentar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xpertis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2, No. 3, 2018, pp. 340 – 356.
- ⑲ 王辰瑶 《反观诸己: 美国“新闻业危机”的三种话语》，《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8期。
- ⑳ Ekström, Mats, and Westlund, Oscars, Epistemology and Journalism, in *Oxford Encyclopedia of Journalism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㉑ Dörr, Konstantin N., Mapping the Field of Algorithmic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Vol. 4, No. 6, 2018, pp. 700 – 722.
- ㉒ Primo, Alex, and Zago, Gabriela, Who and What Do Journalism? An actor – network perspective, *Digital Journalism*, Vol. 3, No. 1, 2015, pp. 38 – 52.
- ㉓ Carlson, Matt, The Robotic Reporter: Automated journalism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labor, compositional forms, and journalistic authority, *Digital Journalism*, Vol. 3, No. 3, 2015, pp. 416 – 431.
- ㉔ Lewis, Seth C., Journalism in an Era of Big Data: Cases, concepts, and critiques, *Digital Journalism*, Vol. 3, No. 3, 2015, pp. 321 – 330.
- ㉕ Lewis, Seth C., and Westlund, Oscar, Big Data and Journalism: Epistemology, expertise, economics, and ethics, *Digital Journalism*, Vol. 3, No. 3, 2015, pp. 447 – 466.
- ㉖ Parasić, Sylvain, Data – Driven Revelation? Epistemological tensions i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the age of “big data”, *Digital Journalism*, Vol. 3, No. 3, 2015, pp. 364 – 380.
- ㉗ Splendore, Sergio, Quantitatively Oriented Forms of Journalism and Their Epistemology, *Sociology Compass*, Vol. 10, No. 5, 2016, pp. 343 – 352.
- ㉘ Becker, Karin, Gestures of seeing: Amateur photographers in the news, *Journalism*, Vol. 16, No. 4, 2015, pp. 451 – 469.
- ㉙ Ekström, Mats, and Westlund, Oscars, The Dislocation of News Journalism: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Epistemologies of Digital Journalism,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Vol. 7, No. 1, 2019, pp. 259 – 270.
- ㉚ Anderson, Chris W., and Revers, Matthias, From Counter – Power to Counter – Pepe: The Vagaries of Participatory Epistemology in a Digital Ag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Vol. 6, No. 4, 2018, pp. 24 – 35.
- ㉛ Brennen, J. Scott, Magnetologists on the Beat: The Epistemology of Science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 28, No. 4, 2018, pp. 424 – 443.
- ㉜ Carlson, Matt, News Algorithms, Photojournalism and the Assumption of Mechanical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Vol. 7, No. 8, 2019, pp. 1117 – 1133.
- ㉝ Godler, Yigal, Reich, Zvi, and Miller, Boaz, Social epistemology as a new paradigm for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New Media & Society*, Vol. 22, No. 2, 2020, pp. 213 – 229.
- ㉞ Graves, Lucas, Anatomy of a Fact Check: Objective Practice and the Contested Epistemology of Fact Checking,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Vol. 10, No. 3, 2017, pp. 518 – 537.
- ㉟ Steiner, Linda, Solving Journalism’s Post – Truth Crisis with Feminist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Journalism Studies*, Vol. 19, No. 13, 2018, pp. 1854 – 1865.
- ㊱ Zahay, Megan L., Jensen, Kelly, Xia, Yiping, and Robinson, Sue, The Labor of Building Trust: Traditional and Engagement Discourses for Practicing Journalism in a Digital Age, *Journalism*

-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DOI: 10.1177/1077699020954854.
- ③⑦ Berglez, Peter, What is Global Journalism?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nceptualisations, *Journalism Studies*, Vol. 9, No. 6, 2008, pp. 845 – 858.
- ③⑧ Hanitzsch, Thomas, Deconstructing Journalism Culture: Toward a Universal Theory,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 17, No. 4, 2007, pp. 367 – 385.
- ③⑨ Martinisi Alessandro, and Lugo – Ocando Jairo, Overcoming the objectivity of the senses: Enhancing journalism practice through Eastern philosoph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 77, No. 5, 2015, pp. 439 – 455.
- ④⑩ Alexander, Jeffery C., Introduction: Journalism, democratic culture, and creative reconstruction. In Jeffery C., Alexander, Elizabeth B., Breese, and Maria, Luengo,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Democratic Culture, Professional Codes, Digital Fu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 – 30.
- ④⑪ 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 ④⑬ Chouliaraki, Lilie, Re – Mediation, Inter – Mediation, Trans – Mediation: The cosmopolitan trajectories of convergent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Vol. 14, No. 2, 2013, pp. 267 – 283.

(责任编辑: 御 风)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Journalistic Epistemolo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in China

Zhou Ruiming

Abstract: Transformation is a keyword about understanding journalism change in China, and is a discourse for journalists to discuss their innovative practice in news organizations. Taking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journalistic epistemology as core concepts, this article is to figure out the normative tenets and empirical approaches for understanding journalism change, how journalistic practices are legitimized, and how news can be used as public knowledge in this period of digital media booming. The Paper, a renowned digital media outlet as a typical case shows that the core tens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lurks between the profession-oriented logic and the networked logic. As produced text, news is separated from journalism; Those who are not journalists are now newsmakers as network nodes. This news making process activates an enduring inquiry about what news is and what journalism is. Also, these actors have entered into a protracted discursive battle of self-legitimization, boundary work, and communal-base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the liquid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journalistic epistemology help to enhance open participation of journalism practice, but it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journalistic practice from dissolving the basic social consensus and falling into relativism.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journalistic epistemology; network society